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二期 ——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7d)

【亲历者言】	“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范达人
【历史真相】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阎长贵 · 王大宾
【百家争鸣】	大将徐海东文革受林彪迫害致死存在着疑问	文 贝
【各抒己见】	文革发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邓小平改革	马双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 / 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亲历者言】

“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 范达人 ·

一、工字厅会议

“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它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10月。我记得，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通知我：“明天，你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去开一个会。这个会很重要。会议内容，你不要对别人讲，回来也不需要向我汇报。”这一番话使我感到奇怪，特别是无须向他报告会议情况。因为按照常规，他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应该把参与的一切活动如实地向他汇报，而且把汇报视为党性的表现。可是，这次却如此地反常，足以显示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和神秘性。

第二天，我去清华工字厅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十二人，北大、清华各一半。北大这边，有中文系的魏建功先生，历史系的周一良先生，哲学系的汤一介先生，研究马列主义的徐琳，北大政工组干部龙协涛，他最年轻，只有二十七岁，我当时在北大历史系算青年教师，其实也已38岁。在清华那边，到会的有王世敏、王朝文、孙中原和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六个人。

人到齐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静宜走了进来，并讲了话。迟群说，把你们清华、北大的同志找来，是为了编一份材料，前一段，我们去林彪住处发现他有尊孔的思想，我们向上（指毛主席）汇报了，上头要我们组织老、中、青三结合的班子，继续收集和整理林彪尊孔的材料。迟群特别强调此事要保密，不得向外人泄密。谢的讲话内容与迟群相仿。

文革中，毛泽东亲自抓“六厂二校”作为文革试点，其中的二校就是北大和清华。毛泽东派他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干部，抓两校的试点工作，具体由迟群、谢静宜二人了解情况，传达指示，贯彻政策。迟群年约40岁上下，原为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1935年生，1953年军委机要学校毕业，1959年起任毛主席的机要员。

收集整理林彪尊孔材料一事，迟、谢指定王世敏负责。王世敏，女，40岁左右，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员，后转到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研室。迟、谢在毛家湾收集林彪尊孔材料时，先在清华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小班子，其中有王世敏。一次江青提了几个有关历史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王世敏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对答如流，江青非常赏识，称她为“女状元”。

二、批林批孔材料小组

我们这次参加会议的人组成了北大、清华批林批孔材料小组。会后不几日，王世敏将我们召集到北大俄文楼的一间教室内，展示他们已经找到的几条林彪尊孔材料。数日后，大家觉得现有内容太单薄，难以做文章，提出再去毛家湾（林彪住地）找一找，看看能否进一步发现一些林彪尊孔的素材。迟群、谢静宜向上面请示后，同意我们小组再去毛家湾查找。之后，我们一行十余人前往毛家湾，查找林彪尊孔的材料。

10月中旬，我们第二次去林宅查找，发现了大瓷缸里林彪写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认为林彪尊孔的思想在此暴露无遗。其中关键的一句是“克己复礼”，要害就是“复礼”。根据杨荣国的说法，孔子的“复礼”就是恢复周礼，就是复辟西周腐朽的奴隶制，也就是复辟。因此，这句话便成为我们日后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中心。此外，我们还看到林彪的笔记本上记有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警句。

大约在1973年12月，我们第三次到林家大院，查找叶群书上的批语，发现有问题的，即抄录在卡片上。我主要查阅《史记》，摘抄了一些她尊儒反法的批语。最后，我们发现叶群的笔记本上记着林彪口授的“韬晦”二字。

根据在毛家湾收集到的材料，我们开始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经过一个多月日夜苦战，材料编妥。它以对照格式编就，即将孔、孟和林彪的言论进行对照，然后加上标题和一段按语。具体写作方法是大家先讨论，然后一人执笔写成。当时我年轻气盛，在前辈面前不知谦逊，往往由我概括而成。例如材料的第一个标题：“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和按语“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的大事。”

1974年1月，我们又到林彪住处核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所引用的原文。

材料编出后的一天，江青要谢静宜去看她的女儿李讷。谢说，我最近很忙，在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江青得知后，当即索取了一份。接着，王洪文、江青将此材料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主席：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它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

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样简明扼要的材料。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在信上批示：“同意转发”。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24日，江青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机关、驻京部队干部会议，由迟群、谢静宜宣讲这份材料。次日，又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干部万人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等党政领导人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大会还是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迟群、谢静宜宣讲材料之后，江青在主席台上问编写材料的班子来了没有。我们这些汇编材料者均非机关干部，全是北大、清华的教员。因此，当时无一人到场。迟、谢立即通知北大、清华党委，要他们迅即将编写材料的人送到首都体育馆。周总理表示没有将我们请来开会是他的疏忽。小汽车立即将我们中间能够找到的人送到了体育馆会场。周总理说这个材料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编得很好。大会结束后，中央领导人在休息室与编材料者一一握手，集体接见。

三、“梁效”的内部架构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表后，我们开始写批判文章。自此，批林批孔材料小组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该组后来常用笔名“梁效”。

“梁效”有三个头头，即李家宽（原八三四一部队文书科科长，当时是北大党委常委、军宣队代表）任大批判组党支部书记，实际负责人；宋柏年（原为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王世敏分任大批判组党支部分书记。名义上，“梁效”还有一个党支部委员会，除李、宋、王三人外，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和卢振义均为党支部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卢振义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支委会，含有“掺沙子”的意思。支委会不常开会，大批判组支部的领导工作均由李、宋、王三人负责。他们三人的直接领导是迟群、谢静宜。谢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接受指示。

三位头头下面，又分成两个大组：材料组和写作组。材料组组长汤一介，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当时有十余人，其成员主要是原先参加编写批林批孔材料的人，除周一良、汤一介二位先生外，还有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史国衡等人。我是写作组组长，负责撰写批判文章。为了加强写作组力量，又从北大、清华增调了一批笔杆子。他们是：杨克明（哲学系教师）、叶朗（哲学系教师）、孙庆升（中文系“文军”写作组长）、胡经之（中文系教师）、朱耀庭（历史系教师）和清华大学李润海、张德等人。另外，抽调了一些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如中文系的卢永麟、哲学系的穆少安和历史系的马朝军。写作组约有十五六人。

由于形势发展，后来写作组又分成几个小组。历史组由我负责，主要写史学方面的文章，如评介秦始皇、孔丘、农民起义等；哲学组由杨克明负责；《红楼梦》组由胡经之负责。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由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教员孙静负责，其任务是注释诗词，供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考。注释组有时还要将诗词译成白话，以便工作人员先理解诗词含义，然后给毛泽东诵读。为了加强力量，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后来又从中文系调来林庚教授和吴同宝先生。

“梁效”后期，据说中央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需要查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著，由于他们不可能去阅读全文，因此专门从北大经济系调来王俊宜，要她在《资本论》等书的重要

段落下面划红线，标重点。此时，除少数人作注释和划线外，其他人全并到写作组，主要任务转向写文章。当时写作组发展到30多人，比较庞大，为便于工作，分成九个写作小组，直属李、宋、王领导。每个小组各有侧重，详见下图：

毛泽东、江青——迟群、谢静宜——“梁效”核心组（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梁效”党支部委员（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周一良、汤一介、范达人、杨克明、王朝文、卢振义）——材料组（组长汤一介、副组长王世敏）、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副组长杨克明）、注释组（组长孙静）、办公室（行政事务郁龙余、印刷常文保）

各写作小组：

范达人小组侧重史学

钟哲民小组侧重政治

叶朗小组侧重哲学

胡经之小组侧重《红楼梦》研究

徐琳小组侧重马列主义理论

孙庆升小组侧重文学

梁英明小组侧重政论与国际问题

汤一介小组侧重哲学史

孙静小组侧重文学史

九个写作小组长均是些“笔杆子”，大多数是教师，唯钟哲民例外，他原是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政工干部，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有两个小组被称为“尖刀班”，我和钟哲民均拥有“尖刀班长”的头衔。可能由于我们两个小组出手的文章比较多些，加上“态度不好”，因而挨了更多批斗，吃了较大的苦头。九个小组，每组三至四人。我们这个“尖刀班”最后仅三人：陈先达、何芳川和我。

“梁效”后来还做了些与大批判无关的工作。例如，全国各地有不少人给中央写信，其中一部分群众来信就转到了“梁效”，由我们摘其要点，综合上报。这超出了“梁效”作为大批判组的职责范围。粉碎“四人帮”后，有人说“梁效”不仅是一个写作班子，也是一个秘书班子，此话不无一定的道理。

另外，江青还曾要“梁效”做过一件与大批判毫不相干的事。一次，江青到新华印刷厂，不知怎么疑神疑鬼，认为新华印刷厂有特务，有人收集她的情报，她将此事告诉了迟群、谢静宜。他们便派宋柏年两次去新华印刷厂调查。最后宋柏年否定了江青的疑惑。

“梁效”最后的成员有：

李家宽 北大党委常委

宋柏年 北大政工组宣传组副组长

王世敏（女） 清华大学哲学教员

马栩泉 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教员

王朝文 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龙协涛 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卢永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田余庆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员

史国衡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叶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卢振义 清华大学电影放映员

孙中原	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员
孙庆升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员
孙 静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员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员
陈先达	北京大学马列主义哲学研究所教员
吴同宝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员
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李润海	清华大学国际共运史教员
陈熙中	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教研室教员
周一良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郁龙余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
张正钊	北京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教员
范达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
洪兆龙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张世英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杨克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林 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杨根清	华大学化学系教员
罗祥文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员
张 德	清华大学教员
赵齐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成勋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教员
胡经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
钟哲民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常文保	北京大学政工组工作人员
梁英明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员
穆少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
魏建功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授、北大副校长

在上述成员中，知名度高的有魏建功、周一良、张世英、史国衡。冯友兰是“梁效”顾问。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梁效”若有事，便到冯府请教，例如，《孔丘其人》写成后，就曾派人登门征求冯老的意见。

“梁效”成员均由党组织选调而来，个人无任何选择权，不像“文革”初期加入群众组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

这一组织最初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1974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

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梁效”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求甚为严格。大批判组内编写什么材料、撰写什么文章都是保密的，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不能向外人透露，甚至也不能向组内与此事无关人员谈及。基本上是各干各的，互不通气。除非需要，才在较大的范围内讨论。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1974年中共中央第一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以后，我们搬进了北大朗润园北招待所。从此，这里便成了两校大批判组的办公地点。此楼原为专家招待所，专供国内外著名学者、教授、专家到北大讲学和学术交流时下榻，楼内装饰较为高雅。大批判组的中、青年成员均在此食宿。每人一室，写作组占用了一层楼。二楼除李家宽和宋柏年外，多数为材料组占用。三楼住着王世敏等少数女同志，偶尔迟群、谢静宜也在三楼小住。二层与其他楼层相比，戒备更为森严，因为搁置了许多材料。闲人不能随便入内，会客只能在一楼客厅。大楼门边设有传达室，昼夜有人值班，这座灰色的大楼的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云雾。

中青年成员每日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唯星期六晚可以回家，星期日晚则必须返回驻地。有时为了赶写一篇文章或准备一份材料，甚至连星期日也要加班。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月自交10元，公家每日补助4角钱。两者相加每月约22元。就当时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的伙食相当不错。早餐有稀粥、豆浆、油饼、鸡蛋等，中、晚餐均为一荤、一素、一汤，夜间加班则有馄饨、包子等夜宵。逢年过节另有丰盛的会餐。

四、一段清闲

在“梁效”期间，我们写了很多文章（部分重点文章的写作情况可参见《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一度很是风光。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梁效”的人感到迟群有点情绪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数明显减少。什么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方知原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关于组阁问题有过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曾有自己的组阁方案，江青曾提议谢静宜任人大副委员长、迟群任教育部部长。后来，他们的组阁计划落空，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当时，我们对内情一无所知，只感到迟群不大高兴，不那么活跃而已。

1975年3、4月间，姚文元借毛主席的话，反复强调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这时候，“梁效”内部传达了江青在4月3日、4日、5日对经验主义的批判。她指出，经验主义是主要的危险、是当前的大敌，是党现在的最大危险，应该加以批判。“梁效”写文章时亦加进反经验主义的精神，例如有的小组起草批判“因循守旧”的文章时，便尽可能地把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融入其中。所谓反对经验主义，当然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有经验的人，指向文革前担任领导工作的“走资派”。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过不多久，反对经验主义问题似乎不再有人提倡，仿佛上面已经“刹车”。传说毛主席对此有批示。后来，我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新华社有一份《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姚文元审阅后上呈毛泽东。这份报告提出，要把反对经验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一项主要内容。毛主席看后于1975年4月23日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毛主席的批示，特别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那一句，显然是针对江青和当时党内的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样的消息对“梁效”封锁，当时，我们无人知晓。

尽管毛主席4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们传达，但是，我们仍然感到气氛的变化。“梁效”从4月份起开始萧条，大家没有什么具体任务，有点无所事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撰写一本秦始皇传记。大家赞同我的提议，并提出赴西安参观秦陵、兵马俑，进行实地考察。可是，李家宽不同意我们去西安，而要我们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参加一点社会实践，不要整天关起门来写文章。

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接触社会，大家都很高兴。与东城区联系后，我们小组到一个做医用手套的乳胶厂劳动。劳动期间，我们应邀参加了东城区“学理论、谈心得”大会。此外，还参加了几次由东城区委为我们组织的座谈会。在这种会上，我们一般只听、记，不发表任何意见，不随便讲话，比较小心谨慎。

在乳胶厂劳动时间不长，仅三周左右便告结束，重又返回“梁效”住地北招待所。之后，便进入7、8月北京最为炎热的季节。可是，“梁效”却处于冷冷清清的状态。当时，我们有一种“断线”的感觉。因为，以往迟群、谢静宜不时地到“梁效”来，常带些上边的精神，而现在，他们很少来，几乎见不到他们的人影，我们没有上边的精神，岂不就像断线的风筝。过去我们的文章经常见诸报端，且往往是头版头条，而现在很少有人约稿，我们这些人空前地清闲。我常以游泳消遣。有一次，在北大游泳池，碰见我们系一位同事，他得意地说：“你们现在没什么事儿了吧？不写什么文章了吧？”我觉得他的话有点不大入耳，便告诉他：“《红旗》第八期不是发表了我们一篇《评林彪的卖国哲学》吗？”他说：“那是你们以前写的稿子，你们的存货。”此时，校园内和社会上已议论纷纷，“谣言”四起。传说毛泽东对江青有所批评。毛泽东就电影《创业》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过去，我总以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所说的就是毛的想法，现在看来并不尽然。“梁效”中大部分人在听到社会上的种种传闻后产生了许多疑惑，比较突出的是一位写作组组长。他私下流露出对江青的怀疑，后有人向上汇报。迟群、谢静宜得知后强调：“梁效”内，不能有人怀疑江青，否则就要立即调离。但是，后来不知何故，此人并未离开，仍留在“梁效”。

上述萧条状态持续了相当一段日子，在此期间，我们就学学理论，读读马列，倒也自在。

五、评《水浒》

1975年春，“梁效”来了位中年女性。她与我们一起用餐，但不与人接触、交谈，偶尔只与谢静宜说上几句话。此人是谁呢？她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卢荻。她是1931年生于东北辽阳，解放前曾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后到解放区；1954年起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后，转到北大中文系。

当时，毛主席已年迈体衰，行动不便，走路需人搀扶，昔日畅游长江的风采已成历史。眼疾更使他备受困扰。他备有两副眼镜，一副只有左腿，另一副只有右腿，供其侧卧时使用。这样看书，时间一长，十分疲倦，对一位耄耋之年的病人尤甚。因此，需要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人为他侍读。经过筛选，最后选中了卢荻。

卢荻先到“梁效”呆了一段日子，由谢静宜向她介绍毛主席的有关情况并交待注意事项。

1975年5月26日，卢荻进入中南海，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据卢荻回忆，1975年8月13日，她就如何评价《水浒》问题，请教毛主席。她之所以就此发问，是因为1974年《北京日报》约北大中文系写一篇评论《水浒》的文章时，希望点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实质。当时，学术界对此反应不一，分歧很大。毛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讲的。接着，他谈了对《水浒》的看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廿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前面。

上述评论，姚文元当日获悉。他立即致函毛泽东，内称主席所提的评论《水浒》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他建议将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评论《水浒》的文章。毛泽东收到姚文元的信后，当天批示同意。

江青于8月下旬，召开会议。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对一百多人讲话时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江青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谢静宜将此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并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当时，上述情况未向我们透露。

在此期间，《红旗》第9期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称：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当时作了反击。9、10月间，他在部分省委书记会上反驳道：“评论《水浒》是怎么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

我认为毛主席与卢荻关于《水浒》的谈话可能属于文学领域之事，但他圈批姚文元拟在全国范围内评论《水浒》的建议就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具有针对性，其矛头指向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

在毛泽东同意印发姚文元的信后，沉寂了一段时日的“梁效”重又活跃起来。“梁效”写了不少评论《水浒》的文章。我们小组撰写并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投降主义的赞歌——评〈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另一题为《林彪与〈水浒〉》。在撰写上述文章期间，“梁效”又从北大中文系调来几位对《水浒》比较有研究的人。我记得其中有吴同宝先生，他有时参与文章的起草，有时参加文章的讨论，向我们提些中肯意见。他用吴小如的笔名写过不少文章，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位专家。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他作的题为“怎样欣赏京剧”的讲座。他边讲边放梅兰芳、程砚秋等人的唱片，讲得有声有色。粉碎“四人帮”后，他与我们一起接受审查，其实他到“梁效”的时间很短，且又主要做注释工作。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传达后不久，“梁效”成员均赴大寨参观去了。这次活动是应大家的一再要求安排的。在半山腰处，我们见到了郭风莲。她梳着两条辫子，穿一双布底鞋，挑着一副箩筐，准备去田间干活。郭与我们一一握手后简单寒暄了几句。我们兴致正浓时，迟群、谢静宜给李家宽打来了电话，通知“梁效”班子立即返回，说有任务。我们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

六、想离开“梁效”

李家宽和王世敏在“梁效”内曾有过一次信任危机。大约在1976年4、5月间，宋柏年召开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全体成员大会，对李家宽、王世敏两人的工作作风进行揭发、批判。迟群、谢静宜也参加了此会并支持大家对李、王二人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离开大批判组，回原单位工作。那天，我正好回家，没有参加那个批判会。事后，有的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会议情况。李、王二人调离后，宋柏年担任“梁效”主要负责人，东语系的郁龙余和中文系的孙静进入领导班子。北大党委书记、原八三四一部队副政委王连龙和北大党常委魏银秋得知此事后，认为处理欠妥，强调即使李、王二人工作作风或其他方面存在许多缺点，但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应调离“梁效”。迟、谢考虑了王连龙和魏银秋的意见，两三天后，又将李家宽和王世敏调回大批判组并官复原职。

1976年春，我的妻子从波兰回国休假。为便于工作起见，她希望我同往华沙。我也想乘机离开“梁效”。我向“梁效”领导打了报告，要求随妻赴中国驻波兰使馆工作。请调报告先交给李家宽，再转送迟群、谢静宜。出乎意外的是，“梁效”党支部、校党委和迟、谢一路绿灯，旋即获准。当时，我以为领导通情达理，照顾我们夫妻两地分居呢。粉碎“四人帮”后，有位头头告诉我，迟群生怕我把“梁效”的情况泄露给外交部，曾几次说：“让范达人走吧！”由此看来，我的请调报告正中他们的下怀。不过，我并没有调成，在等待的过程中，就赶上了华国锋下令查封“梁效”。

七、“梁效”终结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但我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无所知。到10月10日我还不知道这些情况。当日正好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返回“梁效”的途中，走到北大哲学系的路口，天已经黑了，组织组的一个副组长刘隆亨，碰见我，说你还去上班？我说是啊。他说你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啊？我说没有啊，你听到什么消息？他说迟群、谢静宜篡党夺权，搞阴谋，被抓起来了。我心里一震，说怎么就这样抓起来了？这两个是我们直接的领导啊！

我将迟、谢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写作组的成员，但是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有多严重。

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灯光很亮，很多吉普车、摩托车，军队把“梁效”住地包围起来了。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头。一个为首的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中央下令查封“梁效”，你们马上离开，只能带洗漱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我们灰溜溜地走出了“梁效”住地。

从这时开始，“梁效”成员受到严厉审查，写材料，交代问题，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我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八、从严发落

1976年10月中旬，正当我们在写揭发、交代材料之际，历史系一些教员和学生，一边喊口号，一边敲着锣，在北大未名湖畔的红二楼下游斗李家宽、王世敏和魏银秋。李家宽的脖颈上挂着“梁效”头子的木牌，王世敏则挂有“江青的女状元”字样的牌子。魏银秋因为来自八三四一部队，因此，胸前牌子写的是“通天人员”。

由于文革初期我有挨批斗的经历，因此，当时的心情并不紧张。这一天似乎还讲政策，并未把我揪出来，尽管我在“梁效”的位置比较突出，罪名不可谓不大。

可是，好景不长，之后，我被批斗过多次，曾被北大理科的学生和年轻教员揪斗过，也被历史系揪回系斗过几次，既有大会，也有小会。

后来，清查组的火力，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斗争逐步升级，从此，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原先，除开会学习和写交代材料外，其余时间无人看管。此时则不然，平时我不得随意离开红二楼。我的妻子受到牵连，突然从驻外使馆被调回。虽然对我不断施压，但过了一段日子，清查组大失所望，认为我并未交代出什么要害问题，而态度甚至比以前更坏。1977年3月，在全校批斗大会上，北大革委会副主任黄辛白宣布对我和杨克明实行隔离审查。随即，清查组派来两个人进驻我的房间，实行24小时的监视。外出打开水，有人跟着；去食堂用餐，有人盯着。不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当然更不准回家。隔离审查一段时间后，我认为该交代的问题均已和盘托出，再也写不出什么新内容，于是，便索性不再考虑此事，自学起英语来。

后来，为我建立了一个专案组。尽管特地为我的专案组调进新人，增强兵力，软硬兼施不断地审问我，但对我这个“堡垒”仍难以攻克，无甚收获。此时，北大历史系某些人特地在“梁效”受审楼内，贴出一墙大字报，洋洋数千言，对我进行全面系统的“揭发和剖析”，与专案组内外呼应。

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除北大师员工外，还有国务院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和兄弟院校等32个单位的代表。整个体育馆座无虚席，少说也在万人以上。首都体育馆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师是周一良教授的九弟周治良，因此，周先生在其自传中戏称其弟为兄建造了“耻辱柱”与“审判台”。

中午，“梁效”全体成员先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然后，大会组织者下令，从中挑出15名左右“梁效”骨干，等候批斗。鄙人荣占首席，第二名是钟哲民，后边如何排列，难道其详，因为禁止我们东张西望。乐黛云在其自传中说，发现她的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

这15名骨干基本上是“梁效”组长以上成员，外加我们写作小组的两名成员何芳川和陈先达。进入体育馆会场后，我们15名“梁效”骨干低着头，排成一字形站在体育馆中央示众。据说，台上还站着迟群、谢静宜、王连龙、魏银秋、郭宗林、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

这次大会的重点之一，是对我——“梁效”骨干分子，作为从严发落的典型，进行批斗。1977年12月31日《新北大》校报报道：“×××同志严厉批判了范达人卖身投靠‘四人帮’，炮制大量反党黑文，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邓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并鉴于范达人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实际情况，强烈要求从严处理。这一要求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坚决支持。”

随后，党委副书记韦明代表校党委宣布决定：“范达人在隔离审查期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老实交代反党阴谋活动，经北京市委批准，决定范达人由公安机关监护审查。”

此次大会还宣布对一名“梁效”成员从宽处理，他就是林庚教授。林先生是著名的研究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到“梁效”没有几天，专做诗词注释，没有任何问题，将他作为从宽对象，实在是荒唐可笑。

这样，这次万人大会，又称之为体现党的政策的宽严大会。

宽严决定宣布后，就在万人大会上，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在许多学校和各界代表面前，我被公安人员押解出会场，上了一辆囚车。此时，车内已有一人等着我，他就是我的专案组长。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抬头向车窗外张望，公安人员厉声喝道：“你不要看，坐下去，坐下去。”我被迫坐在车内地板上。约半小时后，囚车在一座旧式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大门传达室值班人员首先收缴了我的手表、钥匙、人民币和粮票等随身物品。然后，由一名牢卒领着我往里走。他打开一扇又一扇铁门，阴森迫人，令人毛骨悚然。后来进入一个过道，牢卒令我站住等候，他去询问值班人员，究竟将关在哪个号子。此时，一名剃着光头的犯人把我招呼到他的号子前，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半步桥监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他低声回答。我不由地噢了一声，弄清了自己到了何处。

在狱中，一次，我看到了文革期间北京大学的文革主任、大名鼎鼎的聂元梓。此时的她头发花白，行动迟缓，昔日“光采”荡然无存。我从牢门的小孔中，还看见过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头头李冬民，小伙子剃光了头，时不时与牢卒争吵。看到狱中有这么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懊丧情绪稍稍减缓，我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

在监狱里呆了一年零十九天后，1979年1月17日下午，我走出了大墙，结束了牢狱生活。

我出狱后，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对我进行系统揭发和批斗的×××当面向我表示歉意。据说，当时北大党委要历史系出一人在大会上发言，互相推来推去，最后找到了他。这位发言者到专案组看了我的材料，认为现在材料不过硬，不足以说明我问题的性质，而党委领导却鼓励他：“这事由党委负责，你就这样发言吧！”

说到当时的北大党委，我想到一位副书记，他原是中央团校负责人，后调任北大革委会副主任兼“六五三”分校校长，粉碎“四人帮”后，负责清查“梁效”。在清查中，他极力按照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定下的基调，向我们施加压力，令我们老实交代。一次在俄文楼召开的对“梁效”成员训话会上，他厉声吼道：“范达人，你那篇文章（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如果贴到天安门广场去，你就是反革命，你就会被抓起来！”后来又在一次会上，他指责我们歪

曲历史，说什么“史书上明明记载拥护武则天的人只有八千，你们为什么要写六万人？”当时，我心想是你把史实记错了。对他的训斥，我均沉默以对。1979年，我出狱后，曾为我问题的性质一事找过他，一进客厅，见他正在阅读《资治通鉴》。他看到我，显得非常热情，说了一番颇为通情达理的话。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有才能的，是北大的精华，进入“梁效”是由当时的组织上调去的，不要背包袱，好好工作，努力发挥作用。若干年后，他已到中央某单位任职，一次游览长城时，与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期而遇，当得知其中有我的儿子时，态度十分亲切。这位副书记对“梁效”成员的态度，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至今我也弄不清楚。

□ 《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

## 【历史真相】

### 从四川“揪回”彭德怀的真实情况

· 阎长贵 · 王大宾 ·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王大宾，“文革”中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学生。

“文革”初期，即1966年12月到1967年7、8、9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而后多次批斗，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有关彭德怀的著作和文章出版和发表不少，对这个问题也多有谈及，但仿佛还没完全说清楚，而且错讹不少——我们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尽量把它说得清楚些，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 ◇ 戚本禹通过阎长贵布置“揪彭任务”

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撤了他国防部部长职务，到1965年又亲自点将，让彭参与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并于9月23日约彭德怀恳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到的三条保证（笔者按：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时，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彭德怀去西南地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经过这样开诚布公的畅谈，彭德怀就到西南三线去了。然而时间没过3个月，即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等人说，姚文元（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好”，点了吴晗的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参见《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尽管“文革”的主要目标并非对着彭德怀，但这几句话对彭来说肯定是不祥之兆。

时间大概是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阎长贵到他办公室，急匆匆地对他说：“现在‘海瑞’（指彭德怀）还在四川三线任副总指挥，表现不好，要把他揪回来，你去找朱成昭谈谈这件事。”阎长贵没多想什么，就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他本人的觉悟和认识，他也不会提出什么，他所想的就是，戚本禹交代的任务，一定好好去完成。

戚本禹谈话的当天下午，阎长贵到阜内大街地质部机关找朱成昭（那里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联络站）。见面后，阎长贵跟他说了这件事，朱成昭表示接受这项任务，但他说：

“我去不了，王大宾外出串联在武汉，他做事细心，可以派他带几个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务。”这样谈定后，阎长贵回到钓鱼台，向戚本禹“复命”。（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四年级学生，“地质东方红”一把手，首都红卫兵“三司”负责人；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二把手）

这里顺便说一下，纪希晨先生在他所著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中说：“12月（笔者按：指1966年12月），江青打电话对在成都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王大斌（宾）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对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见该书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不是事实，问及有关人，没有这回事。

#### ◇ 王大宾组织和指挥“揪彭”的情况

1966年10月中旬，王大宾和十来位同学结队乘火车外出串联，王在火车上生病，由同学陪同于汉口下车，在汉口协和医院治病一月余，病稍好，母亲要他回四川养病，此时中央已下令停止红卫兵串联，王和两同学乘“东方红轮”于12月15号抵重庆。12月16日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驻渝联络站负责人张家声、费安琪向他汇报朱成昭的电话，说奉中央指示要把彭德怀揪回京，要王速往成都。

17日晚，王大宾带领在渝的张家声、费安琪等十多位同学乘火车赶往成都。18号早上到四川省地质局北地东方红驻蓉联络站，钱新（研究生）、陈保堂、郑文卿等同学和北地探工系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王大来向王大宾汇报。王大来是前天接朱成昭揪彭总指示从四川南充赶到成都的，并说了他们找到彭总的经过，出示了他们两次同彭总的谈话记录，谈了他们的看法。（王大来是铁路工人之子，195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入党，1960年毕业留校任政工干部，参加农村四清，誓向焦裕禄学习，要扎根农村，四清后，留在房山县官道公社当党委副书记，作为培养工交系统领导干部的接班人进行锻炼。他是共青团九大代表，也是东方红公社所属红干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大来和钱新等人两次和彭总谈话共五六个小时，有笔录几十页（后来交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总是错误的，彭总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彭总支持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认为有深远意义，到三线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他们觉得党中央、毛主席可能不了解彭总的认识和表现，到底执不执行揪彭指示，要由王大宾到成都后决定。王大宾听他们汇报后，认为他们的意见有道理，决定暂不执行揪彭指示。

王大宾也想见见彭总。午饭后，王大宾和王大来、钱新同去见彭总。一见面，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第二大元帅、开国元勋，让王大宾非常敬佩，觉得就像自己长辈一样和蔼可亲，慈祥可敬。王大宾先自我介绍一番：四川德昌农村人等。彭总对王大宾的家乡也很熟悉。晤谈得很亲切、很热情。这更加让王大宾下决心不执行“揪彭”指示。他们告别彭总，回到省地质局就给朱成昭打长途电话，谈了对彭的认识和不揪彭的理由。电话没法说太多，王大宾立即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朱成昭同意。1966年12月19日上午，王大来、郑文卿带着和彭总的谈话记录乘飞机回北京了。

在地院东方红公社向中央文革上呈的不应“揪彭”的报告中有一句话：“彭德怀说：毛主席的话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也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是彭赞扬毛主席，却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这是不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和彭斗了四十几年，深知彭是个老三反分子！你们要管就不惜一切代价，要不就别管！彭说毛主席的话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就是说有百分之一是错误的。这是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

戚本禹认为地质学院东方红不能完成揪彭德怀的任务，对阎长贵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于是戚本禹又给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任务，让他派人去“揪彭德怀”。

地院东方红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12月22日朱成昭又派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乘飞机到成都。胡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身份，把王大宾等臭骂一通，说他们是饭桶，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胡还说，临行前总理给朱成昭指示，只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要和成都军区一起安全把彭押送回京，不能批斗。王大宾不满胡乐成的蛮横态度，和胡争吵。他说：我们向中央反映不揪彭的理由，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你没有权利指责我们，你没有资格骂我。胡乐成说，中央首长点名说你犯了右倾错误，你还不认账？他俩争吵，会场一片大乱。王对胡说，你是专程来揪彭的，我又犯了错误，这事我就不管了，由你来管。在场的同学都不买胡的账，没有一个人给胡说话。这时探工系刘志耕老师出来调解说：既然中央否定了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报告，派胡来责成我们揪彭，我们就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安全地把彭护送回京，这是件大事。刘老师又对王大宾说，中央知你在成都，总理有明确指示，你要执行，不要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不听胡乐成的，万一出什么事，你如何向总理交代？还是配合胡乐成吧，不要争论了。刘老师的话提醒了王大宾，觉得老师说得对。他对胡乐成表态说，既然你是专门来揪彭的，你任总指挥，我们协助。

当场进行了分工，胡乐成坐镇指挥，王大宾协助。有人到成都铁路局联系火车，有人到成都军区联系，等等。下午三点，派出的人马分别回来汇报。到军区联系的人汇报说，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示，表示全力配合红卫兵护送彭总回京。到铁路局联系的人汇报说，铁路局表示大力支持，经请示有关部门，决定安排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和成都军区联系，决定乘12月23日成都直达北京列车。

23日早晨天未全亮，派小车去彭总住地接人，才发现彭总几小时前被北航红旗的学生抓到成都地质学院去了。怎么办？大家议论，北航只派了几个人来，地院东方红在成都联络站有一百多人，人多势众，抢过来。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即去北航红旗驻成都联络站谈判，要他们交出彭总，共同和成都军区一起押送彭总回京。他们不同意，谈判一个多小时未果。此时，地院同学来汇报说：找到彭总了，已经从成都地质学院接到地质局。王大宾和胡乐成立刻离开北航联络站。地院同学把彭总安排在四川地质局一个局长办公室里，精心守卫。这是1966年12月23日发生的波折，只好与成都军区和成都铁路局联系，重新安排专列。

12月25日乘火车回京。王大宾和成都军区谷参谋长陪彭总在软卧车厢，地院同学时来围坐。王大宾陪彭总的时间最长，谈话最多，彼此没有任何戒备心理，毫无顾虑。王大宾讲“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等情况，讲到他们西昌中学校长刘光烈、副校长张光之、班主任张光理1959年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当他讲到农村严重饿死人的事时，彭总几乎落泪了。同学们都喜欢听彭总讲他的历史，没有刁难过彭总，文艺队员还给彭总演节目。总之，彭总在火车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学们下车买了好吃的东西，上车后一定要请彭总品尝。王大宾明白地告诉彭总，我们是受中央指示请他回京的。彭总说，我看出来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们又把我抢了回来。我心里很明白。

在和彭总交谈中，没有人说过任何粗野的话。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地院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对彭总是理解的，敬佩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后来几乎都平反了。彭总非常生气地说，xxx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别人都可平反，就是不能给我彭德怀平反，还污蔑我参与高饶反党集团，什么里通外国，真是天下奇谈！我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那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安排，我又不会外语，什么俄语、英语都不会，每走一步都要有翻译才能动，我能和谁勾结？毫无根据，全是胡说……同学们都很同情

彭总的遭遇。

27日下午4~5时左右，火车顺利到达北京站。车刚停稳，看到北京卫戍区李钟奇副司令员带着一批军人在站台上迎接。车门一开，李副司令员就拿出北京卫戍区的大信封交王大宾，上面写的是“谷万才参谋长和王大宾收”。王大宾抽出信笺一看，上面写着：奉周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王大宾立即将信交谷参谋长看，并向他介绍“这是北京卫戍区李副司令员”。谷说，不用介绍了，我们是老战友。信笺上写什么反党分子，王大宾心里很不舒服，但无奈。总理的命令必须执行。当他们准备把彭总交给卫戍区、彭总准备下车的时候，朱成昭等人赶到了。王大宾把卫戍区的信给朱看，朱生气地说：不行！要先把彭总接回地院。李副司令员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接通后，戚本禹和朱成昭说话，最后商定还是先到地院。因为北京站不能久停车，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地院来了几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车，把近百名师生和彭总接回地院——时间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

朱成昭安排彭总住下，同学们到大食堂吃饭。彭总是老人，王大宾叫食堂煮了一碗鸡蛋面送到彭总住处。朱成昭等人陪同彭总，同时根据随车从成都带回的资料清单找到彭总的万言书，叫人把它抄写下来。

大约三四个小时后，卫戍区从地院接走彭总。

彭总的万言书等材料在地院流传，一股同情彭总的情绪蔓延开来。大概1967年1月初，王大宾主持一次在李贵家的秘密会议，有十多个骨干参加，由王大来等向老干部李贵汇报了“揪彭”回京的经过和他们的态度。李贵公开表示，彭总革命斗争几十年，是革命的功臣、元勋，事实证明庐山会议整他是错误的，现在还要揪他，你们不同意揪是对的。

#### ◇ 韩爱晶的反省

19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教育楼召开了掀起批判刘少奇等走资派高潮的动员会。地院李贵、聂树人、高元贵、王焕参加。7月16日，王大宾主持召开地院革委会常委扩大会，传达15日会议精神，大家认为，批判中央的走资派和地质部的走资派，我们都不了解情况，不去管，我们只管我们院内的事，搞教育革命。没有研究批判谁。会后，王大宾就离校去小汤山医院了。

7月21日下午，聂树人等人到医院看王大宾，说：昨天接到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传达中央指示：“你们地院和北航联合批斗彭德怀，批斗要注意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邀请军事院校参加，批斗时向卫戍区要人。有关批彭材料由中央文革提供。”当日下午，中央文革就送来了批彭材料，包括万言书。对这件事师生反应强烈。有些人看了万言书，普遍认为庐山会议上彭总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被批判是冤枉的。王大宾说，师生的这种情绪和言论千万别向上面汇报，也不要追究，不然，中央文革查下来，老账、新账一起算，我们就非常被动。要批彭总，让北航自己去干，别拉我们地院。常委会研究过了，不听中央文革指示又不行，你说怎么办？王大宾说，只有采取应付态度应付一下。聂说，常委会研究的意见也是这样，应付应付，和你的意见相同。革委会的常委一个也不去参加。

武汉“七二〇事件”（即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事件）刚刚发生，北京示威游行，高呼声讨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要“揪军内一小撮”。地院许多学生也坐不住了，都想往外跑，无法复课闹革命。7月24日，革委会接王大宾回地院，他主持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扣发助学金等处罚办法，不准外出。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了声讨陈再道的百万人大会，包括林彪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只有毛主席未出席（笔者按：当时他不在北

京)，王大宾参加了大会，回来又传达了中央文革不准外出的指示。26日他又去小汤山医院。

7月27日上午，聂树人等人又急急忙忙到医院，非常气愤地和王大宾说：“他妈的，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开批斗彭总大会，把彭总打伤了，大热天，水也不让彭总喝一口，打一位老人他们也下得了手！他们违背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还拉来张闻天陪斗……”又说，事前没有与我们商量，开会前一天才给我们发邀请，为应付，我们只由物探系的几个班的学生打着旗子去了会场，学校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负责人没有一人参加。

顺便说一下，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对他们学校批斗彭总，动手打彭总，把彭总打伤，深感内疚。“文革”后，韩爱晶曾说“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后被判15年徒刑）。他解释说：“我和别人不同啊，我是头头，我一动手，别人就跟着动手了，没轻没重，就把彭总打伤了，打成了重伤，我被判刑，罪有应得。”他认识到，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要总结和吸取沉痛教训！

彭总确实是由地质学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对彭总等人确实一次也没批斗过。

彭德怀传记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有好多学校和单位批斗彭德怀，唯独没有讲到把彭总“揪”回北京的地院——这也是地院师生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明证。

#### ◇ 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彭总1974年去世时，年仅76岁。如果不是“文革”中受到的打击和摧残，行伍出身、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其寿限也许不止此数。

1967年元旦，彭德怀致信毛主席，说：“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见《彭德怀全传》）

彭总这封信撕心裂肺，但未能减轻他的厄运。

“揪彭”事件，王大宾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971年3月开始被打成“小彭德怀”，罪名有“为彭德怀翻案”、不执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怀被平反后，王大宾又因当年“揪彭”回京之罪被处罚。

其实，在揪、斗彭总问题上，戚本禹是直接发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却没有这一条。这是为什么？在审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辩护律师傅志人说：“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这样说，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戚本禹辩护，但没有说到事情的源头。事实是，到四川揪彭德怀，是根据最高指示，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的。周总理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的手令是“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可见当时的境况。

在迫害彭总的“文革”狂潮里，我们都是一粒棋子，我们都有错误，我们向彭总的英灵致歉！



~~~~~  
【百家争鸣】

大将徐海东文革受林彪迫害致死存在着疑问

· 文 贝 ·

最近看了几篇文章，都是写徐海东的。觉得其中的情节和内容不太符合事实，在此讨论一下。

《徐海东大将之女忆：文革林彪派特务秘书害死父亲》（2014年5月1日《老人报》）、《林彪迫害徐海东经过》（2000年8月14日《华商报》）、《徐海东文革遭迫害：这是林彪对我的阶级报复》（徐文惠 / 口述。周海滨 / 撰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文革我替父亲坐牢》（《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刘畅、实习记者周玲《环球人物》（2008年第12期））、《女儿心中的徐海东》（《品读周刊》2010年6月13日）。

◇ 徐海东生平

徐海东是新中国排列第二的大将，老一辈革命家和军事家。

1900年出生的徐海东1925年入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以普通战士参与黄麻起义（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徐海东担任了黄陂县的赤卫队大队长、鄂东警卫第2团团长。1932年，徐海东被任命为红军第9军27师师长，结识了徐向前、陈昌浩及陈赓等红军领导人。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任重建的第26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后任第28军军长、25军军长（童子军）、红15军团军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8年8月，徐海东奉命回延安养病。1939年，徐海东来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的司令员（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1940年1月病倒，在安徽省津浦路西根据地休养。1940年8月在江苏省淮安一带休养。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1946年8月，在山东诸城、莱阳等地休养。1946年9月，从山东到大连市休养。

全国解放后，1954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仍在疗养中。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6年9月，从大连回到北京。1960年10月，主编红二十五军战史。1969年4月，带病出席中共九大，担任大会主席团委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10月25日，被“疏散”到河南省郑州市。1970年3月25日因病逝世于郑州。

综观徐海东的履历，从1925年参加革命，在战场上奋战到1940年。此后三十年基本都在养病。

◇ 徐海东家庭

徐海东农村贫苦窑工出身。斯诺所写《西行漫记》中曾提到，他的“27个近亲，39个

远亲”被杀，蒋介石称徐海东为“文明的一大害”。因参加革命，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

他的发妻田得斋在徐海东离开家乡后被关进大牢，1931年出狱后改嫁。不到2岁的女儿徐文金被三伯父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后来隐姓埋名，做了“童养媳”。

1935年9月，时任军长的徐海东与护理他的号称25军七仙女之一，战地卫生员周东屏结婚。两人育有三男二女。

长女徐文金是元配田得斋所生，1925年生，一直生活在农村，1951年找回，84岁高龄去世。

次女徐文玉，系徐海东在大别山养伤时与已经嫁人的房东家女儿夏国钦所生。据徐文惠说当时徐海东不知道已怀孕，又与后来的周东屏结婚。徐文玉后来担任小学教师。

小女徐文惠，1935年与负责徐海东养伤的17岁卫生员周东屏所生。周东屏原名周少兰，改名“周东屏”，意思是作为徐海东的生命屏障。徐文惠1961年入党时改名“徐红”，意思就是“要女儿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军医大学毕业后在某军区医院工作，文革时因“反革命罪”被关押四年（个人说的）。1987年在王震帮助下迁居香港十年。回来后任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理事长，热心参与红色记忆与革命传统的传播和弘扬。徐海东的许多故事都出自此人之手。

长子徐文伯，任文化部副部长。大儿媳是原安徽省省长黄岩的女儿

二子徐文忠，自幼失聪。

三子徐文连，小儿媳是徐向前元帅的小姑娘。博士，在国外经营公司。

在一些纪念徐海东的文章里，很少谈及次女徐文玉和二子徐文忠，普遍说法是徐海东三子二女，故意疏忽了次女徐文玉。

长女徐文金一直生活在农村，此事被许多人大加褒扬。其实很多中央领导人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对原配所生子女不太重视或疏于照顾。比如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大女儿刘涛（文革中写刘少奇的大字报）、林彪与前妻张梅所生的女儿林晓霖（与叶群关系一直不好）、贺龙与前妻蹇先任所生贺捷生（文革时写贺龙大字报）等等，这里面的感情因素和家庭矛盾往往被忽略。

徐海东四年换了三个媳妇，真可谓三个女儿三个妈。

◇ 徐海东授大将原因难解

事实上徐海东无论从资历还是战功方面，都不具备大将资格。虽然红军时期担任过军长，但当时的军长大多名不符实。抗战时期的最高职务是旅长，而且到1940年就离开战场。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养病，没有多少建树。建国后的职务都是虚职，不仅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而且连工作都谈不上。不仅难以进入大将第二位置，连上将的前二名也进不了。比如上将萧克，红军时期任红八军军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抗战时任120师副师长，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解放后任训练总监部部长。

再比如许世友，与徐海东同是1928年参加黄麻起义。两人1932年都担任团长，红四方面军时许世友任军长，徐海东任师长。1940年许世友任八路军第三旅旅长，徐海东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许世友任山东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徐海东在养病。解放后许世友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徐海东没有实职。

1955年被授大将的原因有人提出过几点。

其一是代表陕北红军。其实徐海东根本算不上是陕北红军代表，真正的代表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促勋、阎红彦。徐海东只是作为一只独立部队25军最先进入陕北，并与陕北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

其二是代表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的部队虽然是红四方面军的基础，却无法代表红四方面军。而且红四方面军已经有了代表人物元帅徐向前和大将王树声。

其三是1935年徐海东曾经援助中央红军5000元钱，所以毛泽东感恩戴德坚持要授徐海东大将并列为第二。“充分体现了对徐海东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评价，尤其是体现了对当年中央红军所处的绝境中徐海东杰出贡献的充分肯定。”（摘自《浴血荣光》，作者：金一南，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这种观点是把共产党人当成讲义气的江湖帮会。

只工作了十五年，八年抗战参加了三年。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建国后没有担任实职的徐海东能评大将本身就有些莫名其妙。位列大将第二位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 徐海东女儿徐文惠文革受林彪迫害入狱查无实据

徐文惠作为徐海东的最小女儿，1939年5月出生于延安。1958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1960年转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以“三好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一直从事医务工作。

按她自己的说法是1968年因反对林彪、江青而被捕入狱，直到1972年才释放。为什么入狱，徐文惠的说法是“替父亲坐牢”

从时间上分析，徐文惠入狱应该不是“西纠”或“联动成员”，因为这批红色子弟在1967年就释放了。

1968年的时节是清查反周恩来的“五一六分子”，包括原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及红卫兵五大领袖等造反派以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方将领都逐渐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而且这场运动维持了许多年。在此其间又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12月开始）。如果徐文惠是1968年被捕入狱的话，不是“五一六分子”就是清理阶级斗争打击的对象，而这两方面的组织领导者都是周恩来，与林彪扯不上关系。如果徐文惠是受林彪迫害，在1971年林彪叛逃后理应释放，而她却直到1972年才放出。

时年29岁的徐文惠当时是解放军总医院医师，作为现役军人为什么被捕呢？他的哥哥徐文伯是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政治部宣传干事，直到1974—1975年才在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他的弟弟徐文连当时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北师大女中的同班同学，校红卫兵头头。而徐海东当时虽然像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到冲击，却一直没有被打倒。

显然徐文惠在撒谎，估计连“隔离审查”都沾不上边，只是为了向自己的政治脸上贴金而

臆造出来的故事。

按徐文惠的说法：“我一直忘不了父亲留给我们的嘱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一口气，不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耻辱。’”然而，她1987年经王震走后门跑到香港十年，难道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97年在香港回归时，定居香港10年的徐文惠又回到北京，不久开始了唱红歌的伟业。也许回来是为了照顾瘫痪的弟弟，因为她一直与弟弟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值得敬佩。

此人现在是所谓开国元勋促进会会长，是“红二代”的风头人物。

◇ 徐海东文革疏散是中央安排的

按照徐文惠的说法，1968年底，徐海东这个在病床上躺了近30年的老人也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他的一位前任秘书，这时当了军委办事组的秘书。这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四处煽动，扬言要“火烧老病号”，说什么徐海东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压制了他。

那些不明真相的人，采取种种方式逼迫徐海东，要他认罪，要他揭发交代，弄得这位转战多年的高级将领陷入了从未遇到过的困境，从来都是畅言豪爽的他，如今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 “我不能死，我要等着党中央、毛主席说话”

1969年3月31日，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就在徐海东焦急等待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郑重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

“主席站在台上看，来回地找，开始大家不知道找什么，后来他问周总理，怎么徐海东同志没来？问了三次。总理就说派人去接了。毛主席就没让开会，等着爸爸到了才开会。在等的这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向到会的代表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达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的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提名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并为主席团成员。”徐文惠的这一段是“中央军委的迟浩田副主席、张万年副主席都和我讲了这个事情”

这段虽然说的有声有色，但迟浩田1969年九大时只是陆军27军79师副政委，张万年是陆军第43军127师师长，怎么可能了解到中共九大的情况呢？

“1969年10月25日半夜，爸爸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第一干休所。那时天气非常寒冷，夜间火车到达郑州站时，爸爸是从车窗抬出来的。爸爸着了凉，引发了高烧。他们不让医院治疗，断了药，叔叔们寄来的药也被扣下了。”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准备和几个老同志告个别。这时老战友王震进来了。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话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要‘疏散’到江西去，这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爸爸到郑州后，住的房子是多年没人住过的，炉子也没有，连油、米都不供应。妈妈只好叫哥哥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的死党刘丰

（武汉军区原负责人）派人去火车上抓哥哥。幸亏哥哥在车上发现及时，才免遭逮捕。为了安全，哥哥把急需的东西送到郑州后没去见爸爸，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请他们帮助买药。哥哥到武汉后，听人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非常生气，一查才得知是刘丰造的谣。”

“张体学叔叔后来告诉过妈妈，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代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们为了折腾爸爸，暖气烧得滚烫，然后把热水放掉再放冷水，暖气管全爆炸，地上有半尺深的水。妈妈和弟弟往外泼水。后来，整个屋子潮气很重，墙上都长出了绿毛，爸爸患了霉菌性肺炎。不能生暖气、房子上面漏水，我弟弟就买煤球炉子生火，窗户盖上军棉被保暖。爸爸不能受凉，一受凉，就咳血。”

“他们不给药品，连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爸爸悄悄写信告诉远在江西红垦殖农场的王震叔叔，王震叔叔千方百计地搞了些急救药品寄给爸爸，但都被林彪、江青一伙在江西的死党给扣下来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不停地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被林彪害死的！”

“爸爸于1970年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发出5条禁令：《人民日报》不登消息；《解放军报》登消息，不登照片；不写评语；骨灰盒上不覆盖党旗；不送花圈。”

这一段描写简直就是《刘少奇的最后时刻》一文的翻版。

事实上关于疏散老干部的通知是196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徐海东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关于中央领导疏散安排的报告是由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王良恩签名上报的，由周恩来指示后下达执行的。把领导机关分散配置，防止因突然战争瘫痪领导指挥系统，是战争准备的基本常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如此安排没有不妥之处。

林彪“一号命令”是根据毛泽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后，已经疏散到苏州的军委副主席林彪10月8日叫秘书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时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的阎仲川根据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口授作了记录，作为“前指”第一个指示，编为“一号号令”。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这些文章显然在时间上玩了个把戏，把徐海东疏散到郑州的时间推后到10月25日，从而栽赃到林彪的所谓“一号号令”上。这种手段与刘少奇疏散的情况同出一辙。而所谓的王震第二天来送行的过程纯是瞎编，因为王震在此之前已经去了南昌（王震和陈云到达南昌的时间是10月20日。见中国当代研究所《王震与新疆》一文。2002年8月3日）。何来26号

还来为徐海东送行！

徐小惠的说法来源于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为徐海东主持追悼大会韦国清的悼词“‘九大’以后，林彪、‘四人帮’对徐海东同志的迫害并没有停止，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使他食宿和医疗条件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含恨去世。”韦国清显然是在说谎，中央应当知道老干部疏散是根据中央1969年10月14的通知，并非是林彪欺上瞒下。

不疏散的话就说是留在北京等死，疏散出去又说是赶出了北京，这件事林彪是里外不是人。

◇ 徐海东受林彪迫害致死存在着许多疑问

“父亲患有气管炎，冬天需要温度高一点，可偏偏派来个特务‘秘书’，爆裂了暖气管。后来，整个屋子潮气很重，引起了父亲霉菌性肺炎。”

徐文惠前面说的是“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代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们为了折腾爸爸，暖气烧得滚烫，然后把热水放掉再放冷水，暖气管全爆炸，地上有半尺深的水。”后来又说是林彪派来了特务‘秘书’，而此时林彪已在杭州。徐海东的秘书应该是已调军委办事组要“火烧老病号”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前任秘书走后又配备的秘书，因此被称之为特务“秘书”。徐海东疏散到郑州仍配秘书说明没有取消待遇，所述在郑州被迫害是无中生有。徐海东在郑州住的是干休所，条件不会差到那儿去。按照徐文惠的说法，粮食及生活用品都是其哥哥徐文伯从北京送来的，问题是已被隔离审查的徐文伯从那儿搞来那么多的东西！

按照后天的说法，林彪之所以迫害徐海东，因为徐海东抄了林彪的老家。“大字报上讲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爸爸一听就火了：‘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队伍到过林家大垮，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和瓦房？’”徐海东的话是对女儿讲的，林彪从何处听到？

还有就是“1966年5月22日，爸爸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他提出了3点建议：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毛泽东的人，真正地达到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5个条件的人；趁毛泽东、刘少奇及其他首长都在，要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在党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封信惹出了大祸。林彪、‘四人帮’诬陷爸爸写信‘叫毛泽东下台，交权给刘少奇’。”此事是否存在不得而知。不过当时林彪还没有被选为接班人，当时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徐海东要毛泽东挖“定时炸弹”指的是林彪还是刘少奇？

一般情况下，人不作死是死不了的。像徐海东这种三十年没有工作的老病号既不能争权也无法夺利，林彪至于如此大动戈来谋害徐海东吗？况且从体系而言，徐海东是林彪的115师旅长，两个人历史上根本没有恩怨。

文革受迫害在后天是一种光荣，即使没有受到冲击也要编造出一些受迫害的故事来。只要在文革期间死去就是被迫害致死，都要按在林彪和江青集团的头上。

徐海东文革受迫害致死的文章经不起推敲，存在着许多疑问。

□ 选自文贝博客

~~~~~

## 【各抒己见】

文革发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邓小平改革

• 马双有 •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及一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理论家们，反复阐明一种观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为邓小平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的特色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云云。

读着这些怪论，让人惊诧莫名！这些专家真是瞪着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胡乱言！

人所共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当时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内容，就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归纳起来，就是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包产到户等。而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正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成果。换言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邓小平改革，为了避免邓小平改革，为了消除邓小平改革。说毛泽东为邓小平的改革打下了基础，毛泽东推动了邓小平的改革，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颠倒是非，歪曲历史吗？

打开文革时期的报纸，一段最为流行的大批判语言，现在看了让人哭笑不得——

“正当我国亿万农民沿着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康庄大道奋勇前进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竟然抛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黑纲领，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广大贫下中农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危言耸听、杀气腾腾的语言，成了红卫兵“打倒”“炮轰”“油炸”“火烧”刘邓的主要依据，成了刘邓垮台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知，邓小平的改革（支持包产到户，主张“黑猫白猫”理论）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当时就遭到毛泽东的忌恨。不只是邓小平，在60年代支持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政策的，至少还有陈云、邓子恢、田家英、胡开明等等，他们都因此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都被打成右倾分子，有的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包产到户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广大劳动人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如果实行包产到户，烈士的鲜血岂不白流了吗？毛泽东直到去世，一直坚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甚至还要将集体化的程度再提高一些，而将包产到户视为和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反革命行为。以致他去世后的1977年，小岗的农民偷偷搞包产到户，领头人还做好了蹲监狱的准备。

还有，邓小平在1975年第三次复出时，面对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混乱的状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邓小平说，这实际上也是一次改革。但他的这次改革，很快就被毛泽东斥为“右倾翻案风”，一阵“反击”，邓便又一次倒台。笔者依然清晰记得毛斥邓的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还是黑猫白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两句措辞严厉、锋芒毕露的语言，像两记重拳，一下子将邓小平打翻在地。

后来邓小平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黑猫白猫论”以及由此推动的包产到户、市场经济等改革措施。而毛泽东在1976年临终之时讲的这两句话，恰恰是对邓小平一系列改革方针的当头棒喝，沉重打击！由此可知，只要毛泽东在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寸步难行，永远无法实现！

所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改革不是奠定了基础，而是设置了障碍，埋伏了杀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不是一脉相承，而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要维护伟人的形象，应当实事求是，不能靠歪曲事实，硬拉强扯，那样只能贻笑天下，让九泉之下的伟人惶恐无地！

□ 摘自《共识网》2014-06-15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